

人文社科新著丛书

近代上海文人词曲研究

李康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近十几年来，出版界愈益为生计所累，纯学术著作因印数较少，出版颇为困难。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高校招生的迅速扩大，整个社会的学术创造力大大增强，学术成果愈见丰厚。有鉴于此，本社决定策划出版《人文社科新著》丛书，意在给学术专著的出版开辟一个新的园地，使广大学者积年研究所得的学术心得能够嘉惠学林，传诸后世。

本社向以传播和译介学术文化为己任，为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出版物而努力。出版一流学者的一流学术著作固然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但学术成果的价值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凡能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颖、扎实的学术著作我们均竭诚欢迎。列入这套丛书的著作，或许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有大有小，但这些成果都是逐年成长累积的学术大厦的必要组成部分。古人云，“积微成大，陟遐自迩”，我们相信，假以时日，这套丛书中一定会出现若干部对学术有重大贡献的不朽名作，这是我们和作者的共同期待。

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林林总总，决定了这套丛书的选题范围比较宽广。在丛书出版的初始阶段，取稿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为主，且暂不作分类，待到有一定的积累和规模后，或可按学科分类构成若干专题。

学术为天下公器，立言可达人生不朽。我们殷切期待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为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序 言

吴熊和

晚清民国之社会文化研究，近年来蔚为风气，究其实，一是前此之唐宋文学，饱学之士已耕耘殆遍，鲜能大有作为；二是晚清民初之文学，自来少人问津，踏入深山，自有骊珠可探。然而，历来治文学史者，总是习惯性地将文学研究按照社会史的进程人为地区隔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且彼此互不通气，致使近代文学的流变不能得到相应的观照。事实是，近代中国是进化与革命的理念转捩点，是本土与西洋的学术交融点，现代文学的许多现象如果不到传统文学中寻找缘由，是很难解释周全的。即便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许多因子孕育于传统文学的胚胎之中。而传统文学虽然到了现代被许多人本着经典的文学革命理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客观地说，其生命力之顽强也不容轻忽，看看现代文学背景的旧体诗词创作，看看现代派文人的词曲研究，或能管中窥豹。

近代上海，承接几千年江南文化的氤氲化育，容受近百年政经气候之波诡云谲，在古今、中西、雅俗的冲击与回应中，实有较前代更为精彩的文学历史，涉水观澜，尽义传神，当为治文学史者之职责。当前，“上海学”正在成为国际性的“显学”，相应地，上海文学的研究也正日益受到学人的关注。但迄今为止关于上海文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小说为考察对象，词曲的研究从未得到重视。可以作为佐证

的是，至今未见研究上海词曲的著作问世，相关论文也是极为鲜见。这种研究状况的出现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基本上是属于小说的，词曲只是边缘。小说家王安忆在《寻找上海》一书中就说：“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相投，那就是世俗性。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但词曲虽是边缘，终究是上海文学的一部分，不应视而不见。何况近代上海的词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现代化都市文明生长史的见证与表现，对于深入理解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品格，对于深入理解词曲这种文体的历史处境，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2002 年秋，康化同志从上海交大来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工作，赓续原先的明清江南词学研究，以近代上海文人词曲为研究专题。研究近代上海文人及词曲，不同于时下流行的某些搜求异闻艳事或怀恋旧日风光的著述，而是要以上海开埠以来文化形态的演变为重点，从这个特定的角度去把握历史的脉络，探寻历史的意义，弄清现实的状况，以瞻望未来的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化同志数易其稿的《近代上海文人词曲研究》，对研究现状尚称薄弱的近代上海词曲而言，具有一定的拓荒性质。

就词学而言，近代上海有着自身的特色。从词人看，近代上海词坛基本上由流寓词人构筑。这再次证明上海是移民城市。而移民城市的宽容性也体现在近代上海词人的关系上，如不同团体的词人之间并没有相互排斥，而同一团体内部的词人也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从处境看，相较于小说，近代上海词坛是被边缘化了，原因在于，词是高雅文体，虽也有与世俱迁的表现，终究限于文体而未能走向大众。这表明上海的文化是世俗文化。从词论看，以蒋敦复为代表的上海词学家都具有精深的学理，但包括王国维《人间词话》在内的近代上海词论都缺乏人文关怀与理性原则。这固然与词体本身有关，与传统思维

有关，也表明近代上海在输入西学方面有重实用而轻人文的倾向。

近代上海的曲学走向与近代上海的城市品格基本符合。就题材而言，近代上海戏曲表现出足够的现实关注，不管是时事剧还是历史剧。而历史剧的多表现明清之际遗民英雄，也与近代上海文人的“晚明”情结相契。就艺术而言，近代上海戏曲表现出的人物平面化与剧本书面化以及性别意识上的男性关怀与女性书写，充分呈现出戏曲在近代背景下应时而动、乘势而上、顺世而变的随俗风尚。就批评而言，较之词学思想，近代上海戏曲理论，不管是王国维的戏曲史论，还是戏曲改良理论，都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尽管尚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却昭示着向现代理论的生成转换。

近百年的上海词曲史是中国词曲史的最后结晶，内部层次繁杂，蔚为大观，且对当代中国词曲影响明显。康化同志的《近代上海文人词曲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我认为，书中的不少论点是人们感兴趣的，或许还将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希望康化同志以此为新的起点，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多的成果。

2008年10月5日杭州

目 录

序言	001
----------	-----

引言	001
----------	-----

上篇 生存空间与文化身份——文人心态及词曲生态

第一章 文人历练与都市	003
-------------------	-----

一、城乡之间：上海之于文人的意义（一）	004
---------------------------	-----

二、中西之间：上海之于文人的意义（二）	026
---------------------------	-----

三、雅俗之间：上海之于文人的意义（三）	043
---------------------------	-----

第二章 历史记忆与“晚明”	066
---------------------	-----

一、“晚明”作为自赏与自责的镜子：上海文人的困境	066
--------------------------------	-----

二、“晚明”作为自新与自强的鞭子：南社文人的追慕	100
--------------------------------	-----

第三章 词曲生态与报刊	120
-------------------	-----

一、身份认同与报刊革命	120
-------------------	-----

二、媒介嬗变与载体更新	149
-------------------	-----

三、阅读普泛与话语转型	189
-------------------	-----

中篇 风云际会与因循守旧——近代上海的词学格局

第四章 由词人的集聚看移民城市的宽容精神	205
----------------------------	-----

一、上海词人的移民身份与文化网络	205
------------------------	-----

二、上海词坛的多元构成与宽容精神	231
------------------------	-----

第五章 由现代的背景看上海词学的边缘处境	255
----------------------------	-----

一、形式守旧与内容创新的吊诡	256
----------------------	-----

二、读者向俗与词体趋雅的尴尬	299
----------------------	-----

第六章 由思想的精深看高雅文体的理论贫困	306
----------------------------	-----

一、蒋敦复与南社人：词学宗尚与个性汨荡	307
---------------------------	-----

二、刘熙载与王国维：思想辨正与理论贫困	320
---------------------------	-----

三、沈祥龙与况周颐：思维取向与时代共感	339
---------------------------	-----

下篇 应时而起与因势而衰——近代上海的曲学走向

第七章 由题材的趋时看上海城市的现实品格	365
----------------------------	-----

一、就时事谱写生存状态	366
-------------------	-----

二、从历史挖掘时代精神	381
-------------------	-----

第八章 由艺术的嬗变看上海戏曲的随俗风尚	391
----------------------------	-----

一、人物平面化与剧本书面化	391
---------------------	-----

二、男性关怀与女性书写	411
第九章 由批评的创新看戏曲理论的现代转换	433
一、改良派的戏曲理论诉求	433
二、王国维的戏曲史论研究	444
参考书目	459
后记	474

引 言

对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中，上海正不断引起人们热切的关注。上海从近代开埠以来，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在短短的数十年内，从东海之隅的一座偏僻小城，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具近代化规模的第一大都市。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此时上海文学的发展速度要比城市的发展速度更为迅猛。近代上海文学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从明清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北京，也使得比上海更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广州、香港黯然失色。一个本来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并不显赫的偏僻小城，甚至在近代也未曾产生著名的上海籍作家，居然一下子便成为指引全国文学发展方向，领导全国文学发展的中心，这一文化现象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正式设县，上海始成为正式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名称。以今天上海直辖市属区来看，最后的建制完成于清朝雍正年间。今金山区境内设置最早，在秦汉时代该地有海盐县，后废。唐天宝十年（751）合昆山、海盐、嘉兴部分之地置华亭县（曾名云间，后称松江），有今上海市大部地区。南宋嘉定十年（1217），置嘉定县，属苏州。元至元十四年（1277），崇明升为州，属苏州。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和万历元年（1573）两次析华亭、上海部分地置青浦。清顺治十二年（1655），华亭析出娄县。雍正二年（1724）又在华亭中析出奉贤，上海中析出南汇，青浦中析出福泉

(后改名金山)，另在嘉定中析出宝山属太仓直隶州。嘉庆十年(1805)，再析出上海南汇部分之地置川沙厅。由此来看，上海建制高潮在明清，而完成于清中叶。

“上海居南吴尽境，古为《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属吴，后属越。”(王韬《瀛壖杂志》卷一)《春秋左传》有言：吴越在春秋时成“敌国”。但在古九州中同属扬州，秦汉时同属会稽郡。唐宋时苏常湖杭邻州毗府，宋元时合并为浙西路。直到明清两代建南京和南直隶，江浙始分治独立。因此，从人文归向上看，我们不妨说上海是属于吴越文化圈的。只是由于上海大部分区县直接从松江、昆山分出，且一直苏松太并称，同归江苏，故在一定程度上，上海与吴地渊源更深。

上海虽然属于吴越文化圈，但即使在明清，它与苏州、杭州的差距仍然很大。明清方志、笔记中，记上海人尚鬼好祀者常有之，但吴中流行的风流韵事、奢华铺张却未之或有。咸丰年间，苏州才子王韬来到上海，他的评价是：“濒海之民，弇鄙近利，尤好争斗”，“盖海滨之民，气质刚劲，举止率卤，读书子弟亦皆俗氛满面，绝无深识远虑可与谈者。”(王韬《瀛壖杂志》卷一)直至开埠以后，上海以“江海通津”超迈“扬州画舫”、“西湖繁胜”、“秦淮风月”，以独立的身份加入吴越文化圈并领袖群伦。

上海与苏州的关系也许最能说明这一问题。苏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主要是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

自隋唐以来，苏州就已是东南巨郡都会，至宋、明、清时期，苏州经济繁荣，科甲鼎盛，人文荟萃，被誉为“科甲之乡”、“东南财赋之区”，不仅成为中国最美丽、富庶、繁华的地方，而且是主导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苏州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文化上的精致与优雅，使它成为

江南地区当之无愧的中心城市。

作为“天下四聚”之一，苏州的富庶与繁华，对于农民造反者来说，当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当太平军攻克武昌并决定沿江东下的时候，内心里想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江南的财赋了，所谓“三江财富尤贼（指太平军）所觊觎”。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苏州及其附近地区便间接地成为攻防易守的战区。1860年5月，李秀成统帅数万大军东征苏州和上海，6月2日，攻克苏州，并以苏州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国苏福省。虽然，此后李秀成曾采取一些稳定社会秩序的有效措施，苏州的工商业一度出现过兴旺的景象，但只要是战区，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恢复和繁荣。1863年初，李鸿章统帅的淮军向苏福省挺进，李秀成与之展开了惨烈的大搏杀。在这场大搏杀中，苏州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随之而逝，文化上的精致与优雅亦如梦幻般消失了。

受战乱的影响，大量避难人口纷纷逃入江南唯一的安全区域——上海租界，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据统计，1862年在上海租界避难的人口多达五十余万，一度还曾达到七十余万。上海租界以一隅之地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成为难民的福地；而难民的大规模涌入，则为近代上海的崛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他们以自己的智慧、资金和技艺等给上海的都市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并与界内的外侨一起共同缔造了近代上海的初次繁荣。王韬说：“上海城北，连薨接栋。昔日桑田，今成廛市，皆从乱后所成者。”“当租界成为城市的主体是时候，上海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它不再是过去那个传统的棉花和棉布的生产基地，不再是普通的滨海小县城，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远东的国际商港。上海正在从‘江南鱼米乡’的那个社会模式中国游离出来，成为镶嵌在东西方之间的一块中性地带，一个新

开发的商业王国。”^①

由此可见，历史并不是纯粹按照事物发展的固有逻辑进行的，文化的强度和历史的厚度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苏州在太平天国战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从1860年代开始，随着条约口岸的兴起，没有文化底蕴的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后的江南则成了上海的江南。苏州的衰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上海对苏州的取代，是现代城市对传统城市的取代。

太平军占领江南后，大批士人迁来上海，内忧外患使经世学更加盛行。吴县冯桂芬、阳湖周弼甫、江宁管小异、归安张南坪，以及徐寿、徐建寅、华蘅芳、华世芳等人都在上海大倡其学。他们这一群人很快与较早时期的上海士人（如南汇张文虎、宝山蒋剑人、仁和龚孝拱——龚自珍子、长州王韬、上海乔重禧等，他们都是生于上海或在少年时便驻上海，最早与西方人交往）思想汇通，形成同治年间洋务思想的策源。这一群人一般都有种共同的思想经历：经历了以明清经世学向含有西学内容的经世学的转换过程。李善兰自幼通算学，是陈硕甫的高足，来上海墨海书馆中受雇于西人，成为谈近代天文历算的第一人。张南坪来上海后亦以其幼习的天文历算之学受雇于西人，后被徐君青罗致授西学。周弼甫在江南称“负经济才”，来上海后便以此论“夷务”。最著名的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交代了他进入上海前后治经世学的经过。“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瞽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爰以避地暇日，笔之于书。”所谓读书十年、涉猎三十年是他在江南、京师研究传统经世学，而避地上海则使其经世之论带有“夷说”，染上西方事务交涉痕迹。这从目录

^① 周武：《太平天国与江南社会变迁散论》，载《史林》2001年第3期。

中也可以看出。《校邠庐抗议》的大部分内容是传统的，如“公黜陟”、“汰冗员”、“免回避”、“厚养廉”……，只有在最后三节“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表现了他上海考察西方治世安邦的经济学、政治学后的思想转变。

同光以后，上海已成为江南社会变迁的中心地带，同样，文化思想亦执江南之牛耳，从江南吴越文化圈的伙伴，一跃成为该文化区域内的中心，并一度在二十世纪成为全国文化中心。这种地位远溯其源的话是江南吴越文化在宋元明清以来的强劲地位决定的。近究其因，则是与同光以来上海成为中西文化交汇地而引起的。上海的近代化较成功，而全国内地则迟迟未有成果。因此，即使上海及江浙地区的变革思想较合理，有内容，但与内地情况不符，于内地心态不洽，往往失败。上海文化，一种健康的改革倾向总是与内地激进的改革倾向、愚昧的排外倾向、顽固的保守倾向在不同时期经常对立。这就是上海文化进入现代以后的艰难处境。

归纳起来，所有近代上海文化的作用力可以归为三个方面，这也是近代上海文化的三对主要矛盾：从纵向来看，是工业城市文化与农业乡村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这是一种历史纵向的矛盾，是近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变革；从横向来看，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它是西方殖民主义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世界市场，造成不同文明之间碰撞后的冲突与融合；从高往低看，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社会的变革，内部阶层的变动导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双向对流。这三对矛盾同时交织在一起，构成近代上海立体式的文化环境，这三对矛盾也在中国其他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都没有像上海这样典型，冲突与融合如此广泛而深入。有鉴于此，研究上海文化，尤其近现代上海文化的发展，应在多元复合的格局下展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洋、高雅与通俗各种

成分的汇合，形成上海自具特色的文化风貌。致力于探讨上海文化的多元复合关系，尤应重视古今、中西、雅俗这三对矛盾的交汇与冲突对文化演进的影响，历史地考察这一文化构成模式的演化轨迹，并将它置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评估其利弊得失。

本文无意全面介绍或评价上海近代文化，而只是就近代上海文人及词曲这一视角以窥上海文化之一斑。

近年来，对于上海文化的过去和现状的关心普遍加强，有关资料发掘和理论阐述日益增多，还出版了若干种专题性史书如《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上海通史》、《上海文化通史》等，在这些著作中有关于近代上海词曲的零星介绍，但不全面，也不深入。为此，研究作为表现现代化都市文明生长史的近代上海词曲，以填补学术领域的空白，是很有必要的。这自然离不开对既有科研成果的多方面吸取。

这里有必要加以界定的是，本文所谓的“近代”，不同于一般历史学家所指称的 1840—1919 年。文学史的分期显然不一定与社会史的分期完全耦合，而即便是文学史分期，具体到特定的区域，又有其独特性。本文在谈上海时所谓的近代，上限始于上海开埠的 1843 年，下限止于南社解散的 1923 年。上海之开埠当然不是文学史的分界岭，但开埠对上海形成自身特色的文学所具有的意义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这将在后文作具体阐述。南社是近代上海文学的重点内容，尽管南社本身并非一个组织严密的文学团体，但它的解散终究削弱了上海的文学，因而以之作为近代上海文学的下限理当可以成立。何况正是在这一年，与近代上海有亲密接触的王国维离沪北上。

鉴于上海在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决非单纯地区性的城市，而是全国经济和文化的重心，是国际性的大都市，故而研究上海词曲，不能满足于地方志式的著录，而必须采取全局性的眼光，运用史家的通

识，才有可能充分揭示其丰富的内涵。换言之，“近代上海文人词曲研究”虽然冠以“上海”这一地方名，但这里的所谓“地方”，并不仅仅是一个狭隘的地方性和区域性概念，而是一个开放性和历史性的概念。所谓开放性，是指本文论及的文学现象虽然都发生在上海，但具体的作家、作品来源、实际的文学效用、影响等又远不仅以上海一地为限，而是具有八方辐辏、影响广泛的特征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开放气度；所谓历史性，是指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发生发展历程来看，作为一种历史事实，随着开埠以来的上海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出版活动中心，上海的近代文化和近代文学（词曲）也逐渐摆脱了地方性、区域性的狭小格局，至迟到二十世纪初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群伦的全国文化中心。因此，如果将上海仅仅视为一个狭隘的地方性和区域性概念，那么文学史上的一些情况就变得过于复杂。举几个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品为例：曹禺的《日出》被认为是写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戏剧，可是曹禺不是上海人，他只去过上海。写的时候，人在北京、天津。作品在上海发表并上演，可却是在京派《大公报》得奖，所以他算是海派还是京派呢？张恨水《啼笑因缘》是写北京的故事，而且写于北京，但它是作者应上海新闻报主编严独鹤之约替上海的读者写的，换句话说，他是在北京写北京，但是写给上海人看。张爱玲《第一炉香》写香港，可是写于上海，张爱玲说她是用上海人的观点去写，是为上海人写作。严格说这是三种广义的海派文学，《日出》是“上海批判”，《啼笑因缘》是“上海趣味”，《第一炉香》是“上海解析”。有鉴于此，本文在谈及上海词曲时，基本遵照以下原则：第一，作者是不是在这个城市生活或写作；第二，作品是不是描写这个城市；第三，作品是不是在这个城市发表或出版，换句话说，是不是在这个城市拥有固定的读者。三者居其一，即纳入本文的叙述视野。

至于本项研究中的“曲”，则主要指作为文人创作的传奇杂剧，不包括用于舞台演出的京剧、地方戏或早期话剧。需要指出的是，传奇与杂剧虽是起源不同的两个剧种，有着各自的体制规范，但在近代，两者之间的文体界限已经消失，表现在人们观念上传奇与杂剧的混淆不清，如古越赢宗季女《六月霜传奇》卷首小引中有云：“会坊贾以采摭秋事演为传奇请，仆以同乡同志之感情，固有不忍忽然者。重以义务所在，益不能以不文辞，爰竭一星期之力，撰成十四折，匆匆脱稿，即付手民。润色补苴，俟诸再版。”^①对传奇不称“出”，而用杂剧之名称“折”。《开国奇冤》作者华伟生在《旨例》中亦云：“本书自《开学》至《圆案》，计十六折。先以《约叙》，闰以《剩义》，共成一十八出。均据实直书，初无臆造。惟《梦警》一折，似涉神怪。”^②都是“出”与“折”混用，不作区别，十分随意。再如杨恩寿的《再来人》一向被称作“传奇”，连长沙杨氏坦园自刊本的目录中也以“传奇”称之，但是第十六出亦即最后一出《庆余》中却将其称为“杂剧”：“（生）这些陈腐填词，已听厌了。你班中可有新出戏文么？（女伶）少老爷这件奇事，长沙地方，有个好事的蓬道人，填成《再来人》杂剧，小班已经演熟了。老爷夫人，就赏点这戏罢。（生）既是把少老爷的事，编成戏文，我和夫人，都是戏中人了。（旦）人生是戏，皆可作如是观，管他做甚？只是戏文太长，恐怕要分作两天，才演得完。你且拣一出好的，演来听听。（女伶）只有第十六出《庆余》，最是有兴趣的。（生）你就演《庆余》罢。（女伶）老爷夫人请看，冲场的就是少老爷也。”对传奇和杂剧已经完全不加区分了。有鉴于此，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并不特别区分传奇杂剧，而是统而论之。

① 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第14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第24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上 篇

生存空间与文化身份 ——文人心态及词曲生态